

· 米沃什作品系列 ·

The Captive
Mind



被禁锢的头脑

(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乌兰·易丽君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米沃什作品系列

被禁锢的头脑

(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乌兰易丽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Zniewolony umysł / The Captive Mind

Copyright © 1951, 1953, Czesław Miłosz

Copyright renewed 1981, Czesław Miłosz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波兰克拉科夫文学出版社 (Wydawnictwo Literackie) 2009 年版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1-13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禁锢的头脑 /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乌兰, 易丽君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

(米沃什作品系列)

ISBN 978-7-5495-1121-1

I. ①被… II. ①切… ②乌… ③易… III. ①文学评论—波兰 IV. ①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1722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 魏 东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31260822-88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10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888)

黑格尔式的蜚伤

——《被禁锢的头脑》中文版导读

—

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的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①的《一九八四》更加伟大和富有意义。奥威尔的那本是预言幻想小说,重在描写人们在巨大的外部压力及恐惧之下,如何思想变形,完成了从属和归顺的过程。身在英国的奥威尔,并没有亲身经历极权主义,没有看见它是如何从一个社会内部成长出来。实际上任何被称为“怪胎”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是外来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写在1951年的这本,重心放在了当时人们如何从自

^①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身的处境、困厄及个人野心出发,自觉并入强势力量,最终变成了压力的一部分。书中所见所闻,为作者本人亲身经历。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斯拉夫语系教书,在波兰故乡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课堂上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传。曾经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他被隔离的原因在于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早些时候,他从波兰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时值冷战初期,巴黎的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正陷入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此书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巴黎的波兰侨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于恐惧和投机,而是由于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责他在为共产主义“做宣传”。一位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人已经在现有体制中拥有体面位置,居然还要流亡他乡,一定是疯了。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他支持的人中有两个光辉的名字:法国作家加缪^①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②,后者为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德文版写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还在于尽管饥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

①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的神话》等。

②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精神病学家,代表作有《时代的精神状况》、《哲学入门》、《伟大的哲学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等。

和身份去赚钱。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内他为自己出走的选择感到“罪咎”和“羞耻”，这种感觉伴随了他一生，他认为那除了是一个灾难，而不会是别的。1960年他去了美国，一待三十年，一边教书，一边坚持波兰语写作。“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①

冰冻解除之后，米沃什于90年代初回到波兰，病逝于克拉科夫。他的诗歌与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国一直有译本出版。80年代末，老诗人绿原译出了米沃什诗选《拆散的笔记簿》，这本诗选成为许多中国诗人的最爱。近些年，《米沃什诗选》、《米沃什词典》、《诗的见证》陆续问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在人们翘首以盼很久之后，终于有中文版面世。

“被禁锢的”一词在波兰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并不仅仅是强迫的，而是有着心甘情愿的意味，这使得这本书拥有了极为丰富的阐述空间。

二

米沃什来自立陶宛一个贵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属

^① 《我忠实的母语》，切斯瓦夫·米沃什：《拆散的笔记簿》，绿原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页131—132。

于波兰。他的家族属于说波兰语的上层社会。当时的立陶宛首都维尔诺(Wilno),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为立陶宛驻法国外交官员,用法语写诗。米沃什与他的年轻同伴,也有一个先锋诗歌的小圈子,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一个维尔诺的年轻诗人头脑中所想的问题,与一个法国年轻诗人没有什么分别。在当时国际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青年米沃什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惭。

如此美丽的一个地方,却再三被外来强权占领与蹂躏。米沃什在书里“伽玛,历史的奴隶”一章的开始写道:“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过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禁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诗集,在当地享有文名。他与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诗歌流派叫作“灾变派”,年轻人已经清晰地感到灾祸就在不远处。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①,瓜分了波兰,立陶宛归属苏联,红军开进了维尔诺。1940年米沃什从维尔诺逃到华沙,参加了左派的地下抵抗

①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别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另称《德苏条约》或《希特勒—斯大林条约》。

组织。1941 年这个地方被德军占领。1944 年,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这个地区。两次目睹苏联军队占领,米沃什将某种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还粉碎了每个被压碎的国家居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维尔诺的命运是整个波兰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写。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这一回,闯入者最擅长的还在于,将自己描绘成历史进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新信仰”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仍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演进,处于当事人的视野之外,而新信仰则把客观发展的“历史”替换成了“第一人称”,声称他们这些人正好代表着历史运行的方向。

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实际上并无选择。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如何与眼前的局面达成妥协。米沃什用“开船前的恐惧”来形容这种精神状态。社会危机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机,忘记了他们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他们尽力想要忘却。

该书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①发表于 1932 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永不

^① 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 (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 1885—1939), 波兰先锋派作家、画家、摄影家。

满足》，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热门哲学人物胡塞尔、卡尔纳普的话题均在其内，然而书中的气氛却是诡异不幸的，人们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往日争论不休的问题，会变得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联结一个社会里的不同人群——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的人有了依靠，感到自己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让自己觉得自己百无一用的人们，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即无意义感。原有的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而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人生缺乏意义。某种情况就像我们这里曾经命名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在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更容易被吸收进新体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套东西的蛊惑。

三、必要性。在上下文中，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不能与现实的运动保持

同步。在种种干扰之下,他“写作冲动的源泉就已浑浊不清了”。那种叫作新信仰的东西,据说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不仅是获得未来人生的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也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个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他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他们现在正以同情和鼓励的眼光看着他。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他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于是,他终于“渡过了转折期”,一条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无限展开。

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米沃什的观察力是惊人的。他强调,在波兰作家当中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两年之内,他已经感到不能忍受,意识到了后面即将到来的一劫不复的精神灾难。

对于西方列强的失望,也是东欧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书中有一章叫作“看西方”,在其中,今天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也能够找到许多共鸣。稍微拉远一点看,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遭遇到的这些问题,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重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入需要个人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样的支持。

米沃什设想后来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没有

就黑格尔式的历史运行观做出一番讨论吗？他的回答是：议题是人家设计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其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某种情况与中国一样：一个人即使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唐诗宋词这样精美的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仍然一无所知。

米沃什揭示了某个晦涩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层是个人前途及道德危机，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服膺（臣服），他没有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出于外在压力。面对一场“精巧的辩护”这种批评，米沃什的回应是，他只是诚实地写出了自己看到的東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们自己的解释和理由写进书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叙述，而没有为了仇恨或怨恨，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们的需要。

三

每本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淘洗，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锐地指出，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都表情坦然，轻松而

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的紧张、晦涩和难言。受到“辩证法压力”的人们则充满了矛盾。人们必须演戏。必须戴上面具。在大街上、办公室、会议厅、工厂,甚至在起居室,人们说每一句话都必须考虑后果。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出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愈演愈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那个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出席一切在他看来荒唐的仪式和表演,争取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去,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得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堂而皇之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

仅是因为工作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在恶作剧的水平,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实际上,我

对其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英雄”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憎恨把人们的人性拉向比较低矮的去处。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音乐的唱片,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位,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正在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并因为自己拥有这些伪装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满意。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人们摇身一变,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们表现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米沃什认为,伦理凯特曼,是一种最为强劲的凯特曼,包括能够做到对原先的朋友铁面无私,告发周围的人以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无从打听。结果是人们患了各种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相分离,与他自己之间隔着一条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哪些

是真实的,哪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么是该喜欢的,什么是该抛弃的。事情原有的界桩被一再移动,他日益变得含糊含混。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因为拥有某个不谨慎的开头,继而步步迈向谎言的深渊,越走越深,难以自拔。如果说最初还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么地方,渐渐地,他变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模模糊糊地认为能够蒙混过关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他照样也可以挑战社会 and 他人:打着真与善的旗号,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恶,与他的大环境处于互为辉映的“镜像关系”当中。

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人们离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耻成了新的道德观。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因此该书既是与他留在波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也是与他自身的对话。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今天特别匮乏的。今天所谓溯本追源,也应该包括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复原。一个人起码要坚持住自己,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块仅仅是遭受损失的大陆。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①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

^①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 1946—),波兰思想家,波兰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创办人及主编。

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切·米沃什）。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四

书中还有四个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应该都是有现实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米沃什原先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气质十分边缘的人们，如何逐步进入了“历史”的大门。在一个宏大背景之下，米沃什又提供了具体的个案。其中“道德家”阿尔法是最有深度的一个。这个人本身追求完美、纯洁，力求无懈可击，这使得他的选择带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一位作家，在战争期间也会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创办了地下文学刊物，写作有关“受难”、“忠诚”主题的小说，表达了与纳粹决一死战的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祖国和荣誉高于一切。然而，还存在着个人信念之外、比个人信念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现实”。实际情况是，地下抵抗带来了重大牺牲，同时更多的人在集中营里被枪决。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仅仅个人拥有的“忠诚”概念便显得远远不够。

1944年的华沙起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端。这是由远在伦

敦的波兰“地下国家”发动的。其时苏联军队已经到了易北河对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

情形的复杂性在于,波兰人对于俄国人同样忧心忡忡,深知其吞并或瓜分波兰的野心不死。因此,指导起义的流亡政府便期盼能在红军到来之前,有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这样才有可能将主动权掌握在波兰人自己手里。这个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现实却不允许。

米沃什将之形容为“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其中一个巨人(俄)比另一个巨人(德)更有耐心,始终按兵不动,等待着苍蝇被一个巨人杀死之后它才出场。结果是,两个月内华沙上空浓烟滚滚,手中武器为手枪、手榴弹、燃烧瓶的人们,完全不能抵挡来自德军的轰炸机、坦克和重炮,二十万人痛苦地死于残酷的巷战,华沙变成一片废墟。幸存者逃进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诚于他的波兰祖国,而不是屈服于苏联红军,他就会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忠诚”,便显得无效、愚忠、狂热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忆了他本人与这位道德小说家一道迷失在华沙起义后的废墟瓦砾中的情景,他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一片沉寂”。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木板出现了。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红色的漆写道:“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谁是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有谁知道他到底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所携带的是什么样的任务?他是谁的儿子?或许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些了。那块木板上的字,就像是“从一个被毁灭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